



# 「唐宋八大家」称谓由此确立

## 辽博藏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为明朝初刻本

本报记者 郭平

### 壹 这部书在明代曾多次再版

研究“唐宋八大家”称谓的由来,明刻茅坤编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(以下简称《文钞》)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存在,这部书珍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辽博典藏部副研究员张书慧告诉记者,这部书是明刻茅坤编《文钞》的初刻本。

这部古籍前面有《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》,《总序》的题款为“万历己卯仲春归安鹿门茅坤撰”和“侄茅一桂校刊”。

万历己卯为明万历七年(1579年),比对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所记可知,《文钞》初刻本共144卷。辽博藏本是残卷,仅是其第一部分《唐大家韩文公文钞》共16卷12册。幸运的是,全书的总序保存完整,书中的《韩文公文钞引》也保存完好。

史料记载,明刻茅坤编《文钞》刊刻于杭州,当时便受到追捧,一书难求,以至民间多次再版,甚至出现了借用茅坤的影响力印制“唐宋八大家”文集的相近版本。

目前人们知道的影响比较大的第一次再版发生在明崇祯元年(1628年),此时距初刻本发行已经50年,在时任山东学政的方应祥主持下,茅坤《文钞》得以再版,后人称其为“方应祥刻本”,全书共166卷。

方应祥在《重刻八大家文钞叙》中简单介绍了这一版本的刊刻缘由,写明:“因向吾友孝若氏,乞其家藏手批原本,捧持以往,为东方指南。此愿不遂,乃与子将及其甥杨次弃,谋校雕付梓人,公诸四方。”这里的孝若,是茅坤的小儿子茅维,字孝若,又号僧崇,是明代著名的戏曲文学家。方应祥以山东学政的身份向茅维借阅家藏的茅坤手批原件用于再版,却没有借到,不得已与其子和外甥杨次弃寻找校对人和出版商,将《文钞》再版发行。这件事侧面反映了当时茅家人已经注意到了茅坤编《文钞》的遗产价值,也为茅家人自己再版祖先著作埋下伏笔。

果然,在“方应祥刻本”再版仅3年之后,明崇祯四年(1631年),茅坤之孙茅著重新修订了茅坤《文钞》,并主持了另一个新版本的刊刻,即“茅著刻本”。

茅著刻本有题:“归安鹿门茅坤批评,孙男陶叔著订。”其《跋》记有:“虎林本行世既久,不无模糊……虽谈父书,希绍祖业,用是与舅氏吴毓醇重加考较,精于杀青。”所署落款为:“岁在辛未,跋于虎丘之卧石轩。”

辛未年为明崇祯四年。事实证明,茅家对当时的图书市场判断是非常正确的,对此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记载:“今所行者,皆著重订本也。”说的是茅著刻本刊行量大,后世用的都是这个版本。

### 贰 最初是茅家子弟的课本

张书慧说:“这部《文钞》虽是残卷,但是跨越400多年时光,书册除了一些岁月留下来的斑痕,基本保存良好,字迹清晰易读,是经过藏家精心保存过的‘幸运者’。”辽博藏明刻茅坤编《文钞》采用的是白棉纸,这种纸张与明代印书使用量较大的竹纸比较,造价更高,更耐保存。

书籍的《总叙》《文旨》及各卷《引文》部分采用楷书,目录及正文用的则是宋体字,部分反映了雕版印刷技术在明代的发展水平。翻看书页,每页9列,每列19个大字,正文里面经常出现竖排小字,这是茅坤的批注。正文的字里行间还不时会出现长串的水滴状黑点,这是茅坤做的标记,认为是值得借鉴的佳句。

茅坤生于明武宗正德七年(1512年),湖州府归安(今浙江湖州)人,嘉靖十七年(1538年)中进士。历任青阳、丹徒两县知县,因政绩卓著,于嘉靖二十四年(1545年),擢升为礼部和吏部官员,后受牵连在嘉靖二十五年(1546年)被降职。后来,两广总督应请旨调茅坤至广西参与征剿军务。嘉靖末年,浙江总督胡宗宪聘请茅坤为幕僚,共商抗倭事宜。因家人横行乡里,茅坤被削籍归家,至此结束官宦生涯,专务家业,《明史》载“用心计治生,家大起”。

茅坤家业富庶,热衷收藏。茅坤的藏书在当时声名远播,书楼名“白桦楼”“玉芝山房”,有藏书楼数十间,仍然装不下。

此外,茅坤还投入大量时间教育家族中的子弟,《文钞》便是在这个过程中选辑完成的。

茅坤在《唐宋八大家文钞叙》中提到:“予于是手授韩公愈,柳公宗元,欧阳公修,苏公洵、轼、辙,曾公巩,王公安石之文,而稍为批评之,以为操觚者之券,题之曰《八大家文钞》。”也就是说,茅坤选编唐宋八大家的文章,是为了给学写文章的人们提供一个参考资料。

对于茅坤选编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更详细的缘由,茅坤的外甥顾尔行在古籍卷首的题词中讲得更细一些,大意是说茅坤仕宦之余爱好读书,而且担当起了教育家族中子弟读书的使命,以帮助他们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良好的成绩。

所以,《文钞》未刊刻以前,其实是茅坤专门编选的家内课本,为族中子弟举业,参与科举考试而精选的文章,而且已经使用了十几年;书中的那些评语大都是他平日授课时所讲,由其侄茅一桂所记。

作为茅坤自编的“科举宝典”,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一经刊刻,在此后数百年间对明清的知识阶层产生了重要影响,其中固然有“唐宋八大家”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为人喜爱的因素,也与当时的科举取士制度不无关系。

### 叁 「唐宋八大家」散文是几代读书人的选择

张书慧说:“‘唐宋八大家’之名虽然成于茅坤的《文钞》,但是对唐宋古文的欣赏和研读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。”

早在南宋时期,文学家吕祖谦在《古文关键》的总论部分选取了唐宋时期古文作者12家,并对各家分别说明了渊源、长短,以韩、柳、欧、苏为主流,曾、巩、苏辙次之。南宋著名学者楼昉在所编著的《崇古文诀》中,第一次选齐了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文章,“唐宋八大家”的群体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。

到了南宋末年,著名的爱国诗人谢枋得在其选编的七卷本《文章轨范》中,选录韩、柳、王、二苏文章59篇,反映了那个时期文坛对唐宋诸家的推崇。

元末明初,朱右所编著的《唐宋六家文衡》没有流传下来,但是这部著作首次在名称上标举了唐宋古文,可见唐宋古文在当时文人中已有一定影响力了。此外,这部书在文学史上首次集中编选了唐宋八家的古文,之所以称“六家”,是朱右将“三苏”合为一家。

到了明代,在茅坤之前,还有明代散文家唐顺之编撰的《文编》和《六家文略》,其中《六家文略》选录韩愈、柳宗元、苏洵、苏轼、曾巩、欧阳修、苏辙、王安石八家散文,只不过“三苏”仍被视为一家。此外,明中期散文家归有光还编有《四大家文选》,此书独选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苏辙四家,反映了这个时期人们对唐宋古文家地位的认可度。

茅坤编《文钞》的刊行和再版,第一次用“唐宋八大家”名称,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文章经几代文人的推许,已成为当时研习文章写作的范本,受到出版商不断的改编且书籍印刷得也越来越精美,“唐宋八大家”逐步被当时的知识阶层认可和接受。

到了清代,《文钞》热度不减。据历代书目志和当代各类古籍目录可知,在清康熙年间就有两次大规模的刊刻记录,而且均由当时较为有名的苏州私人书坊“云林大盛堂”刊行。

此外,围绕“唐宋八大家”还出现了多种“唐宋八大家”古文选本,不过各种版本所选的“唐宋八大家”篇目乃至作者的排序都有所不同,靠前的韩、柳、欧、苏氏父子六家自晚明以来都相对固定,王安石、曾巩的位置偶有对调。直到清代诗人、学者沈德潜编著的《唐宋八家读本》刊行,“唐宋八大家”文章的篇目和作者排序才相对固定下来,传承至今。可见,“唐宋八大家”的作品是公认的中国古文中的精品,是几代读书人选择的必然结果。

以茅坤《文钞》为核心的这个庞大的选本体系不仅盛行海内,也盛行于海外,清末时期,日本几乎家家有这部书的日文版本,可见其影响之大。

(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)



辽博藏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初刻本及内页。

### 小讲堂

XIAO JIANGTANG

#### 初刻本

刻本指的是雕版印刷而成的书。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。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,至宋代,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。

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,由于时代、地域、刻书者、刻版形体及印刷技术的不同,产生了许多形式各异的刻本。从时代上区别的有唐、五代、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等刻本。因地域不同,有浙本(浙江地区刻本)、闽本(福建地区刻本,因以建宁府建安、建阳两县为中心,故又称建本)、蜀本(四川地区刻本)等。因雕版刻印的早晚不同,有初刻本、覆刻本、影刻本等不同称谓。初刻本是指书籍编撰完成后首次刊刻的版本,因为时间上最为接近原著,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版本价值。

### 新视界

## 编者茅坤是个「古文痴」

郭平

张书慧说:“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编者茅坤的经历很有特点,他是个‘古文痴’,他对唐宋散文的认识有一个较大的转变过程。”

明代的文坛有很多文学流派,对于茅坤,后人将其归入“唐宋派”,并将其列为代表人物。这一文学流派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“道统”,主张“文道合一”。

茅坤年轻时深受明代“前七子”影响。“前七子”是主张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的文学团体,代表人物为李梦阳、何景明、徐祯卿、王廷相等,这群作家凭着少年锐气,起身反抗迂腐不通的八股文以及雅正有余、生气缺乏的台阁体。从茅坤的《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》中,人们知道茅坤年轻时对秦汉古文的痴迷达到了逐字逐句模仿的程度,稍稍模仿得不像,就会忧伤难过,而对唐代以后的文章不屑一顾。

如果茅坤文学之路照此走下去,“唐宋八大家”名称的确立可能受到影响。

在茅坤的好友当中,有明代散文家、《文编》和《六家文略》的编撰者唐顺之。嘉靖二十二年(1543年),茅坤补任丹徒县令,此时唐顺之正被削籍归家。他途经丹徒与茅坤见面,结交论文,遂成知己。唐顺之将韩愈比作司马迁,又将宋代的

欧、曾、“三苏”比作韩愈,劝茅坤不要轻视。茅坤当时不服气,作《复唐荆川司谏书》阐述自己的观点,认为文章本于“六经”,《史记》离“六经”最近,所以气度尚雄厚,规制尚宏远。欧、曾离“六经”远,所以风调愈下,神气愈离。写文章应当追本溯源,直追“六经”。如果效仿欧、曾,就会迷失方向。唐顺之随即复信答辩,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,各个时代的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风采,唐、宋文章自有其奥妙。

从茅坤传世的信件中,人们知道,茅坤的转变发生在嘉靖二十五年(1546年),当时茅坤34岁,仕途不顺,发奋读书。他广泛阅读汉代司马迁、司马相如、刘向、班固,以及唐韩愈、柳宗元,宋欧阳修、曾巩、三苏等诸家文章,细心揣摩他们文章的旨意,在《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》中,他评价唐宋诸大家的文章“琴瑟祝鼓,调各不同,而其中律一也”,他将唐宋诸家的文章比作各种不同乐器,声调虽然不同,但是内在音律是相通的,由此认识到以前一味刻意模仿司马迁的文章,仅学到了皮毛,并没有掌握内在规律。

此后,茅坤在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辞官,隐居40余年,以授徒讲学为业。他编选的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也在这一时期完成。